

沈 津 編 著

顧廷龍年譜

送書敬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叶編著

顧廷龍年譜

送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顧廷龍年譜/沈津編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325-3828-1

I. 顧... II. 沈... III. 顧廷龍-年譜
IV. K82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71804 號

顧廷龍年譜

沈津 編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 × 1194 1/32 印張 30.5 插頁 12 字數 721,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828-1

K · 612 定價: 9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62662100

序 一

王鍾翰

近年來，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三館商議，共同編輯出版顧廷龍、趙萬里、潘天禎、冀淑英（女）四位先生的學術文集，命名為《芸香閣叢書》。芸香為複葉香草，古人藏書時用以驅書蠹也。四位先生畢生精力獻身於圖書館事業，乃當代海內外學界公認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四大專家。他們的寶貴經驗留給了後人無價的精神財富，他們的名字和著作，將與中國圖書館事業永遠共存。而其中顧老以學識高深，博聞廣見，授益當代，造福子孫，尤為四大家之翹楚。

予猶憶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洪煊蓮（業）師自美返國，取道上海，九日顧起潛學長延洪師至合衆圖書館（今上海圖書館）午餐，出示鄧正閻舊藏顧千里手校陸校本《史通》（原注見《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頁二十五）。洪師北歸後，檢讀舊稿。疑此本乃《天一閣書目》中范堯卿所謂第三刻本者之流。因函托起潛學長代雇書胥影抄一部。起潛學長覆書謂書手不可得，擬從葉揆初先生校錄之本，手製勘表，以饜師望。起潛書法雄麗，師素所珍玩，況此落葉掃後，橫錦織成，勝百朋之賜矣。起潛學長之品學書法見賞於洪師有如此者。

翰生也晚，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初，始由長沙雅禮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迨升至三年級時始選修鄧文如（之誠）師主講之魏晉南北朝斷代史課程，而同時選修鄧師此課

2 顧廷龍年譜

者，即有顧起潛學長。儘管年齡與學識相差不止一級，卻得以同班受業，從此時起翰遂成爲顧老忘年之交。

日月如梭。轉眼六十載光陰忽焉已過，起潛學長竟駕鶴西歸有年矣。翰學識謏陋，淺見少文之輩，今亦竟被囑爲顧老年譜作序，實愧不敢當。作爲顧老之後學，忝顏塗鴉，誠不足發揚顧老之潛德幽光於萬一，洵有負顧老哲嗣誦芬同志之雅命矣。是爲序。

二〇〇三年八月，時年九十整

序 二

王煦華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在上海誠明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畢業後，系主任顧頡剛先生介紹我到他的族叔顧廷龍先生主持的合衆圖書館工作。我在圖書館工作二十八年，計在合衆三年；一九五三年合衆捐獻，改名歷史文獻後五年；一九五八年與科技、報刊、上圖四館統一後又二十年。二十八年來，一直在顧先生領導下工作。一九七八年我應頡剛師之召，奉調去北京後，與先生還常有書函往還；晚年先生因病移居北京，又時親聲咳，二者加起來又二十年。在圖書館工作時，先生以我對事情考慮周詳而有主見，不隨波逐流，並直言相告，尤其在四館統一前八年，館中事無大小，先生垂詢而後定。爰就回憶所及，縷述於後，以資紀念，亦藉以留一點合衆的史料。

合衆圖書館創辦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捐獻，僅有十五年的歷史。發起人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遺三先生和其他的董事陳叔通、李宣龔等，雖都是愛護祖國傳統文化的知名之士，但均非資財雄厚之巨富，所以一開始就困於財力，工作人員很少，一切因陋就簡。可是，十五年來，為保存祖國文化遺產和科學研究服務，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贏得文史界學人的廣泛的贊譽，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這些貢獻與贊譽是和顧廷龍先生的主持館務和艱辛的支撐分不開的。

合衆創辦十餘年來，各項經費實際上是葉景葵先生獨力籌

措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他逝世後，經濟來源斷絕。董事們先向浙江興業銀行透支，再向上海幾家大銀行和香港幾家大企業募捐到一批款項，才得以維持到一九五三年捐獻。由於經費的不充裕，所以工作人員一直很少，最初僅總幹事顧廷龍、幹事潘景鄭、朱子毅三人。到一九四六年才增加了黃筠一人，但潘景鄭先生不久又回蘇州他就。其後，杜乾卿、沈燮元來館。黃、沈沒多久就先後離去。我到館時，僅剩下顧先生和杜乾卿先生（管理閱覽室兼蓋藏書章及鈔寫），當時朱子毅先生僅星期日来整理收支賬目，還有一位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胡文楷先生則在星期日來幫助編目，他是研究閩秀的專家，畢生搜集閩秀著作，撰有《歷代婦女著作考》。此外還有裝裱工華敏初（《汪穰卿師友信札》就是他裝裱了三年完成的）和工友陳履剛。我到館後，起初是清理以前編的草片，後來則是採購書刊和編目。合衆不公開閱覽。讀者來閱覽圖書，需要單位或專家介紹。他們來看書時，顧先生在館時大都由他接待，他外出時由我接待，我們都為讀者查書和到書庫取書、還書。我的老同學楊鑒住在合衆附近，常來看書，這年下半年，顧先生問起我他有没有工作，我說還沒有，他教我問他願不願意來圖書館工作。我將此意告訴楊鑒後，他就欣然來了。他來之後，就整理十多年來入藏的中文期刊，後來由他一手編成《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期刊目錄》。附在後面的西文期刊，則是捐獻後由梁玉齡編的。由於歷年來入藏的圖書都未做過財產登錄，顧先生又要我介紹一個鋼筆字寫得端正的人來登錄，我把朱一冰寫給我的信封給他看了，他看了信封上的字跡予以認可，朱一冰就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來了，除了登錄歷年入藏的古籍外，兼作新書編目分類，義務工作多年的潘承圭女士也改為正式職員。此時正式職員七人，工友一人，是合衆職工人數最多的時期。還有一位當時在上海自行車廠工作的洪駕時先生（以前曾任職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多年來為合衆抄了很多罕

見的舊刻和稿本,《合衆圖書館叢書》中有一些書和幾種館藏的書本目錄,都是他手寫後石印和油印的,還有顧頡剛先生的《西北考察日記》、《浪口邨隨筆》、《上游集》,劉厚生先生的《張謇傳記》也都是他刻蠟紙油印的。

合衆圖書館誕生於公私藏書流失,古籍淪亡的抗日戰爭期間,徵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是它的藏書主要來源;其次是在這些私家藏書的系統上有目的補充,以擴充原有的系統,所以私家捐贈的藏書實際上也就是爲合衆收購的,一九四九年顧頡剛先生捐贈一批清末民初的史料給合衆後,在四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

予以清末民初之史料、雜誌等贈合衆,皆彼館所未備,喜得其所。予自幼遇書攤必拾一些歸,而不知正爲合衆積也。

這批贈書於一九五三年編成《顧頡剛先生藏書目錄》,油印一百冊。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曾跟顧頡剛先生到他蘇州懸橋巷老家,挑選抗戰期間內地出版的書刊,凡合衆未有的均贈與合衆。我造了一份清冊,可惜合衆捐獻後,忙於瑣務,未能編成書本目錄,至今引以爲憾。其中有一冊《論持久戰》是毛澤東主席寄給他的,他寫了一個題記,作爲紀念。其他各家所捐贈的,如葉景葵、張元濟、李宣龔、葉恭綽、胡樸安、周志輔、潘景鄭等先生的藏書,都是他們數十年來有系統的收藏。因此,合衆雖祇有十五年的歷史,但從藏書收集來看則應從清末算起,那就已有五六十年的積累了,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的系統。

合衆徵集私家藏書共同保存,得到社會各界的信賴,這裏舉我到合衆以後經歷的三個例子來說明:一是南洋中學校長王培孫先生的藏書,一九五二年學校由於發展的需要,要騰空房屋,所藏七萬余冊古籍不是中學所需要的,想捐獻出去,他們考察了上海各圖書館,認爲合衆最合適,可是合衆是私立的,又覺得不

合適，後來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把書捐獻給上海市文化局，建議撥交合衆保管，得到文化局的批覆同意，由合衆點收造冊。二是五十年代中華書局遷京時，於一九五三年舒新城先生等決定把抗戰以前出版的樣書五萬餘冊，全部捐贈給合衆。三是蔣竹莊（維喬）先生的捐贈日記，蔣先生是鴻英圖書館的館長，鴻英又以蒐集近代史料著稱，按理他自己一生的日記，應該捐贈給鴻英保存，可是他卻捐贈給合衆。蔣先生是我的老師，他寫了一明信片給我，說他的一生日記要捐贈給合衆保存，教我到他家中去取。可惜這張明信片在十年動亂中遺失了。由此可見合衆在文史界有很高的信譽。

合衆收購的圖書，是遵循顧頤剛先生收集中國書籍的思想的。顧頤剛先生認為應該破除“聖道”和“古文”的傳統觀念，打破過去藏書樓以“經、史、子、集”為書籍全體的看法，樹立“蒐集材料”的購書宗旨，把圖書館辦成“供給許多材料來解決現代發生的各種問題的”機構。他認為要收集的中國圖書有以下十六類型：一、經史子集及叢書；二、檔案；三、地方志；四、家族志；五、社會事件之記載；六、個人生活之記載；七、賬簿；八、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九、基督教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十、宗教及迷信書；十一、民衆文學書；十二、舊藝術書；十三、教育書；十四、古存簡籍；十五、著述稿本；十六、實物圖像。顧廷龍先生在《介紹顧頤剛先生撰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中說：

我從事圖書館古籍採購事將五十年，即循此途徑為採購目標，頗得文史學者的稱便。（《文獻》第八輯）

正因為合衆論接受私家捐贈的或歷年收購圖書都是為了供研究者參考的目的而有系統蒐集的，所以董事會在捐獻時，特提出：“本館圖書儘可能不予分散以保持為參考便利而蒐集的系統”的請求，得到文化局批覆可予同意。可見合衆自始至終堅持系統地蒐集材料的宗旨，並且希望捐獻後也能保持下去。四館統

一後的上海圖書館正是在合衆系統基礎上陸續編成了《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中國近代期刊篇名彙錄》、《硃卷集成》等大型工具書和資料書，得到文史界的好評。

顧廷龍先生之所以能成爲著名圖書館事業家，我認爲是他一輩子堅定不移地實踐了顧頡剛先生的爲供科學研究者而蒐集材料的辦館宗旨，爲文史研究積累了系統的豐富的材料。五十年代初，我經手補充清末民初的舊期刊，舊書店、書攤送來的樣書不僅和館藏有重複，而且相互之間也有重複，但都不肯拆賣，讓我們補缺期，往往爲配補一期，要買好多期複本，使我很爲難，乃商之於顧先生，他看了一下，認爲有材料，他說如果怕重複不買，失之交臂，以後就難以有機會再配補了，決定盡力收購配補。前幾年《古籍新書目》第一二〇期上刊載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圖書館所藏《圖畫日報》，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此時配補的。清末以來的文史學術刊物，合衆經常注意收集，在上海其他圖書館找不到的，到合衆來查閱，大都能解決問題，這也是文史界稱便的另一個原因。因此爲了供研究者參考的目的而收集保藏的圖書資料不限於它的形式，而以圖書資料的內容系統爲核心，所以十年動亂中把原合衆的期刊併到徐家匯藏書樓後，有的研究者反映感到不方便，這就是把原本的圖書資料系統分散存放帶來的後果。

合衆圖書館由於財力人力微薄，一些現代圖書館對入藏圖書的基本加工整理工作都沒有做，日常收購及個人零星捐贈的書刊，僅用老式賬簿作一簡單的登記，再做一式三份的編目草片，就入庫上架，然後再在草片及登記簿上注上書架號。用的是固定排架；期刊沒有劃到卡，僅在書架上用刊名四角號碼排列。基礎條件這樣差，檢索工具如此簡陋，來館尋檢圖書資料的專家們爲什麼又稱便呢？奧秘在哪裏呢？

原來合衆創辦的目的，僅“專供研究高深中國國學者之參

考”，來館閱覽者都是專家學者，以及由他們介紹來的有志於文史研究的青年學者，他們都有研究課題，都是爲了查閱研究課題所需的圖書資料而來。合衆雖沒有卡片目錄供閱覽者查閱館藏，但工作人員熟悉館藏，業餘又都有所研究，能够靈活地運用圖書資料，所以祇要他們提出科研課題所需要的圖書資料並說明哪些已查閱過，還需要查閱什麼，即使他們不知道的，祇要合衆有的，都可以提供給他們，也有合衆沒有而其他館有的，有些則已亡佚失傳的，我們無不竭誠相告。所以文史界的專家學者及青年學子到過合衆的，都同聲稱便。另外合衆雖無卡片目錄可查，但有據草片校對後編成書本目錄可查。張元濟、葉恭綽、葉景葵、蔣抑卮、胡樸安、顧頡剛、李宣龔、潘景鄭、周志輔等先生捐贈的，都按家編了書本目錄，零星捐贈及歷年收購的則合在一起編了書本目錄，這些書本目錄印成後分送高校文史系及科研單位及著名的專家學者，則他們在家中或本單位就可知道合衆的館藏，這也是文史界稱便的一個原因。

顧廷龍先生說：“不是自己有所研究，就不能理解圖書資料的內容，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圖書資料的運用，也不會重視圖書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同上）這是他觀察顧頡剛先生治學歷程的體會，也是他主持合衆圖書館十五年的工作總結。或者說是他一輩子從事圖書館事業的經驗結晶，顧先生這些話，我覺得對在省市以上大型公共圖書館或專業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中，應該有一部分研究人員從事文獻研究工作，以提高圖書館的服務質量，是有重要的現實的意義。但圖書館研究人員的研究，應偏重於圖書文獻資料的研究，使各方面的科研人員能充分利用館藏的圖書資料文獻，充分發揮它作用。當然也可以作些課題內容的研究，因爲兩者本是相輔相成，祇要能分清主次，就不僅不會影響圖書館的日常工作，而且會提高圖書館的服務質量，爲學者歡迎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往事猶歷歷在目。顧先生勤儉辦館，愛館如家，珍惜每一分錢的艱苦創業精神，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而他系統地蒐集圖書資料，為科學研究服務，特別是“俯首甘為孺子牛”般地為青年學子無保留提供研究資料的精神，更永遠是圖書館工作者的楷模。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序 三

沈 津

辭舊迎新，年年如此。當二〇〇四年新年的鐘聲悠揚響起的時候，我的耳旁似乎聽見了紐約時代廣場百萬人的歡呼，同時還夾雜着波士頓查爾斯河橋畔人群的互相祝福聲，當然，我彷彿也看到了北京、上海競放的那映亮天際的五彩繽紛的焰花，以及那載歌載舞歡慶喜悅的情景。這個時刻，我的心情也並不平靜，我仍然在為這篇序言作最後的文字潤飾。有道是，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回首那一年又四個月已逝去的業餘時間，我實在是把我幾乎全部的心力投入到這本《年譜》的寫作上去了。無論是編例、本譜，還是人物索引、書題留影，這其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從書桌旁堆疊至桌面的各種有關資料的複印件而來，那千萬字的資料已被閱讀並被濃縮成了這百萬字的《年譜》。看到已輸入到電腦中的每個字符、每個句子、每個段落，我都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觸，因為正是這一條條、一段段的累積，才逐步使全書形成了有條理的譜文。在即將寄出《年譜》的光碟之前，我還是想對自己說，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我以為這本《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本書是帶着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

二十世紀初，我國的公立、私立圖書館相繼建立。百年來，在中國圖書館學界裏，出了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如繆荃

孫、柳詒徵、沈祖棻、袁同禮、蔣復璁、劉國鈞、皮高品、汪長炳、李
小緣、姚名達、王獻唐、王重民、趙萬里、屈萬里、顧廷龍等等，他
們在分類法、目錄學、版本學以及圖書館的管理上都作出了非凡
的、重要的貢獻。有的學者雖然沒有專著出版，但他們默默無聞
地用圖書館的專業知識提供給研究者許多訊息和便利，或編出
了各種專題目錄、索引，他們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是值得人們
贊賞的。可是，在這些有貢獻的專家、學者、教授去世後，後人雖
會記得他們，但是幾十年來為這些學者樹碑立傳，或有關研究他
們的專著卻少有出版，至於寫出年譜更鮮見其有。

這本書的寫作原先是我的朋友吳格兄所做的。二年前，他
曾寫信給我，希望我能支持此事。當然，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後來我才知道，吳兄作為博士生導師，再加上本身的業務工作，
自己手裏的幾個大項目都壓在他的肩上而分身不開。由於二〇
〇四年是先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所以《年譜》要趕在其時出版
恐怕有些困難。

二〇〇二年七月下旬，上海圖書館迎來了五十周年慶典，我
被邀作為嘉賓而自美飛滬，而先師哲嗣顧誦芬院士夫婦也由北
京蒞臨上海出席盛會。在慶典的最後一天中午，上圖的繆國琴
書記、吳建中館長宴請誦芬夫婦，我也叨陪末座。席間談及先師
一百周年誕辰紀念之事，也議論了先師未出版的文稿以及為先
師編寫年譜一事。誦芬先生非常清楚年譜的寫作不易，且也知
吳教授的困難所在。我作為先師的學生，理解並明瞭家屬和領
導們的心情。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並和內子趙宏梅在越洋電
話上談了此事，並表達了我想接手此年譜的寫作意願。次日下午，
我將返美，在上海浦東機場候機廳內打了幾個電話給上圖舊
日的同事和朋友，徵求他們對寫作先師年譜的看法。承蒙他們的
鼓勵，並應允將先師手札等予以提供，這對我來說，更增添了
寫作的信心。

返美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即開始了《年譜》的寫作，一周後，我將寫出的樣式約十餘張稿子以及我為什麼想寫先師年譜的信寄給顧誦芬。不多久，誦芬即有回信，表示支持此一寫作，並願意提供先師的日記原件複印件，以及先師和顧頤剛先生之間的互通信件等。在此期間，我也打電話詢問吳格兄，如果他願意繼續此年譜的寫作，我願支持，如若有無法分身及時間上的問題，我可否接此題目。吳兄很爽快地說，希望我能撰寫此一年譜。今年一月，吳兄即把他寫的約二萬字的初稿全部用計算機傳給了我。這是我非常感謝他的。

截止到二〇〇二年十月底，根據我手頭上的材料，三個月內我寫就了大約十二萬字。其間我和誦芬通過幾次電話，也寄了碟片給他，請他就寫作上的事提出意見。十一月初我利用休假，去了香港、北京、濟南、南京、上海，除了探望我父母外，主要就是收集有關先師的材料。在北京，誦芬、江澤菲已為我準備好了先師的日記，他與顧頤剛之間的互通信件以及有關家世的資料（均影印件）。我也將先師遺留的小記事本全數翻閱一過，並將有資於年譜寫作的綫索或可提供時間考證之處全部複印。這十來斤重的複印件在我返滬和返美之時，均刻不離身，因為它們對我的寫作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二〇〇三年十月底，《年譜》的初稿已大體就緒，大約寫了近八十萬字。十一月中旬，我再次抽暇返國，在上海、蘇州、廣州繼續收集材料。誦芬為配合我的寫作，在百忙之中，亦如約飛滬。在先師上海的寓所內，誦芬和我翻閱了大約數千通先師友人的來往信件及其他材料，並選出部分有價值者，在上海圖書館的幫助下全部複印了下來。然而我却再也擠不出時間到上圖去覈查原合衆圖書館及歷史文獻圖書館的檔案材料了，當然，我也無法再飛北京翻看在北苑所存的部分友人來信了，這是十分遺憾的。

年譜之作，昉于宋，盛於清，是以人爲主，並繫以年月之人物編年史。蓋以一人之道德文章、學問事業關係史學甚鉅，而其焜耀史冊秩然不紊者，則有賴于年譜表而出之。津早年嘗讀年譜十數本，有自訂年譜，也有子孫爲其先人所作，也有門生爲其師尊所著，又有後人因嘆服譜主在學術上造詣之深，而搜輯行實作譜者。究其目的，均在表彰前人之學問事業。所以說年譜的重要，是因爲那是爲歷史存真，爲歷史作證的學術著作。年譜的難作，難在蒐集資料的不易，許多資料都必須點滴積累，而絕非立馬得來，一蹴而成。即使得到了資料，也需要時間去思考、研究，甚或考證。因此，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重要學者的年譜很少，津曾對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全國總書目》作了一次統計，即二十世紀中的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語言、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科技、衛生、農業、林業等領域方面名人的傳記很多，但是年譜却出版了不足百種。由此可見，年譜的編著有一定的難度。

由于年譜敘事詳明，並可循是以求其時代背景，以及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所留給後人之影響，故先師對於年譜的撰著極爲重視。一九四九年時，他曾自告奮勇，欲爲張元濟、葉景葵編撰年譜，但“因循坐誤，至今引爲憾事”。先生所著《吳憲齋年譜》，其始輒苦事蹟多湮，搜訪不易。及讀其家書並致汪鳴鑾手札，所獲稍多，事無公私巨細，往往詳悉。而後來所編的《嚴久能年譜》則遲遲不能定稿，蓋材料仍不足也。

日記是寫作年譜的重要依據，我始終認爲，日記雖非系統而詳細的敘述，但卻是片段的真實史料。先生的日記內載有其個人讀書、友朋交往、其時之學術動態、清末民初文史掌故、遺聞軼事，以及版本書畫鑒賞等。我在邊閱讀邊輸入的情況下，彷彿也陪侍先生，進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時的時空感覺。因此，這本年譜的四十年代所載，多以日記爲基礎，然而，《日記》也並

非完整。最初存有一九三七年，但是斷斷續續，直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始，方始爲每日功課。這樣完整的日記延續到一九四五年，以後直至六十年代則所記寥寥了。日記都是寫在印有“合衆圖書館”的格紙上的，先生的書法在四十年代即小有名氣，日記上所書多爲行書，偶作楷法。四十年代的日記最長的爲一九四二年，大約有四萬餘字。

先生嘗謂，近三百年來先賢年譜，其材料得自尺牘中者最爲親切，故余亦甚留意于此。也正是如此，先生昔日多次告我，整理、鑒定、運用尺牘的重要性。因此，在寫作這本《年譜》時，我盡我之所能將收集到的先師書信及友朋手札，多選取有用的內容編入年譜。我以爲如果我也像某些年譜那般，僅僅寫上某月某日致某人信，那別人就不知所云爲何？也不知從何處去進一步覈查，它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

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九六年上圖新館開館慶典前，我先飛去北京探望先師的情景。大約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所以老人家見了我表現得很興奮。我告訴他，我們師生兩人實在是有緣份的，因爲六十年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採訪主任，後又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平採訪處主任，爲“哈佛燕京”選購圖書。而一個甲子後的今天，我卻在“哈佛燕京”司善本書管理之職。這難道是巧合嗎？抑或“命中注定”？先師笑而不答，卻和我談起了和“哈佛燕京”的裘開明館長的交往。美國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學之一，近百年來，國內的莘莘學子和有志青年都希望進入哈佛攻讀，三十年代的先生也不例外。

實際上，先師和“哈佛燕京”是有關係的。先生的《吳憲齋先生年譜》和《古匋文彙錄》，就是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而出版。三十年代末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分類法、四十年代初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藏書目錄》在出版前，就是美方寄去北